

红墙 图志

撰文 / 顾保孜
摄影 / 杜修贤
钱嗣杰
侯 波
徐肖冰

1949—1976

1949—1976

下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红墙 图志

撰文 / 顾保孜

摄影 / 杜修贤

钱嗣杰

侯波

徐肖冰

毛泽东

1949~1976 下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





紅軍不怕遠
征難
不怕水
不怕山
不怕年
關
五嶺逶迤騰
越浪
白頭冢
浮屠走泥丸
金沙浪拍石
崖暖
大渡橋橫鐵
索寒
更喜岷山
雪
三軍過後
盡開顏
右長征詩一首
毛澤東



1961年，毛泽东在庐山寓所读书（佚名摄）



1954年,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(佚名摄)



毛泽东(佚名 摄)



1965年时的毛泽东(佚名 摄)

月桐。恰同此子。
 年，凤舞新正，
 书生空在，
 挥斥方遒。指点
 江山，激扬文字，
 粪土当年万户侯。
 莫道。三
 千水，浪遏飞舟。
 右心園書

獨
立
風
秋
淑
北

去
揚
子
洲
長
安
東
山
如
道
唐
路
出
京
梁

漫
江
錦
石
遠
有
秋

分
于
流
雁
鳥
好
年
中

共
魚
相
涉
底
第
第
平
如
足
競
自
由

長
河
空
廣
闊
看

茫
大
地
誰
主
波
聲

當
南
北
風
吹
雨
打
時



1973年8月，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（佚名 摄）



第八章

“文革”浪涌

发动“文革”

1965年11月12日,毛泽东乘专列再次离开北京。离京的前两天,上海《文汇报》丢了一枚重磅“炸弹”。此时他的思绪犹如奔驰的车轮,滚滚向前

进入1965年,江青的文艺活动更加活跃且频繁。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,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因为前一年,在全国现代戏观摩会后,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进行评论,这就等于给了江青一把“尚方宝剑”。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。她要继1963年5月《文汇报》刊载《驳“有鬼无害”论》之后,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“有分量的批评文章”。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,只是由针对“鬼”变为针对“人”。

江青到上海后,找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。柯庆施知道江青想找“笔杆子”后,给她介绍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张春桥。城府极深的张春桥没有直接允诺,而是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“青年文艺评论家”——姚文元。从此,姚文元登上了更大的政治舞台。从1965年8月开始编写,到11月10日发表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,他历时近5个月,中间10次易稿,可谓煞费苦心。

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,彭真便得知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,当即嘱咐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《文汇报》——那时上海的《文汇报》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。

与此同时,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。

恰在这关键时刻,毛泽东又要“远足南巡”了,离开他认为“空气不好”的北京。这距离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刚一个月。

这一次,专列将驶往正在酝酿“政治风云”、制造“重磅炸弹”的上海。

11月12日,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,经天津南下。他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。毛泽东一开始就问:“我最近有什么指示?”

他们回答:“备战,备荒,为人民。”

毛泽东一听,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“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”,很不满意地说:“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!”

毛泽东又问:“你们看,搞‘四清’好,还是不搞‘四清’好?”

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,众口一词:“显然搞‘四清’好。”

毛泽东无奈地摇头。

毛泽东离开天津后,沿着铁路线,先后到了济南、徐州、蚌埠与南京,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。

毛泽东一路视察,像往常一样,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。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、备战和“三线建设”、领导方法、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。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。

因此,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,才能打开局面。

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文章,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,向全国发行。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“甩石头”,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沉寂局面。这块“石头”,成为发动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导火索。



1965年的毛泽东(杜修贤 摄)

11月12日至26日,华东六省的党委机关报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。

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,而且压力一天比一天大。正如江青后来所说:“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,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。后来主席生了气,说出小册子。小册子出来,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。”

彭真知道毛泽东“生了气”,知道《解放军报》准备转载,不得不给《北京日报》领导去电话,指示转载。11月29日、30日,《北京日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才先后被迫转载这篇文章,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。

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提出:“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。对海瑞和《海瑞罢官》的评价,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,我们的方针是:‘既容许批评的自由,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;对于错误的意见,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,实事求是,以理服人。’”两个按语的目的都很明确:对待《海瑞罢官》的问题属学术问题,应当贯彻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

短短十几天,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转载了此文。

一年多后,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谈话时讲道:“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。前年11月,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,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。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,不能组织班子,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,写出这篇文章。开头写,我也不知道,是江青他们搞的。先告诉我要批评。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,到上海去组织,我都不知道。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,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,周恩来、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,因为要给他们看,就得给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彭真、陆定一这些人看,而刘、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……”

不久,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、无署名,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。这份文件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的?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,但他未加以说明。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,毛泽东在谈到“四清”运动时说:“王光美在河北省搞‘四清’,河北省领导不了,华北局也领导不了,是他(指刘少奇)亲自领导的。他有他的长处,我有我的弱点。他有一股硬劲,我爱妥协。我说不行,他说行。……他是第一副主席,瞒不住他……”

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、暗藏玄机,对刘少奇、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了。

转眼到了11月24日,毛泽东没有忘记一位美国友人的生日,她就是已经定居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。这位在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女记者,经过漫长岁月对新中国的访问与报道,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不是祖国却胜似祖国的国家,并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结下了一生的友谊。这一次,毛泽东特地邀请她来上海过生日,并同时邀请其他几位在华居住的外国友人,让他们也来上海为斯特朗贺寿。于是柯弗兰夫妇、爱泼斯坦夫妇、马海德夫妇等十多位外国朋友由北京飞来上海,一起接受毛泽东的接见,并共进斯特朗的生日午餐。当天晚上,周恩来还以总理的名义为斯特朗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宴会。

他们到达的时候,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在门口迎接。这一举动让斯特朗多少有些吃惊。因为江青从在延安起一般是不会在这种场合出现的。

斯特朗当然不知道,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。毛泽东正在酝酿着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。江青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她不仅频繁地抛头露面,而且将参政的触角越来越深地探进了政治高层,甚至探到了毛泽东的心灵